

N 本期聚焦

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从哪里来

刘志彪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现在虚拟经济发展过度了，必须回归它的原有功能。只有让虚拟经济回归自己的基本功能，发展实体经济的成本才能降低，发展环境才能优化，发展新动能才能形成。

怎么分类看待过剩产能以便做好去产能工作？

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去产能工作。去严重过剩的产能，是为了重新恢复实体经济的正常供求关系，推动实体经济企业持续复苏和振兴。落后产能主要有三种：在技术层面，指以落后技术和工艺装备为基础的生产能力；在市场层面，指丧失了竞争力的生产能力；在政策层面，指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不达标、不合规的生产能力。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去产能，就是把前两类落后产能全部交给企业和市场调节。而对第三种落后产能，政府应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各种准入门槛来完成淘汰目标，加强规则意识，减少计划意识；加强选择意识，减少指令意识。这是良性产能治理的要件。

为什么要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

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给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既是为了其减负增利，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金融风险。当下，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搅在一起，很难区分其边界，因此重点去企业杠杆十分必要。另外，现在中国企业负债也很高。这样下去必然危及和掏空实体经济，使我国经济提前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维持降低企业杠杆率，一是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二是要加大股权融资力度，降低银行贷款比率；三是要加强对债务的软性预算约束的管理，强化企业自身对债务杠杆的硬约束。

怎样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要给实体经济企业加大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的力度。降成本具有双向调节供求关系失衡的政策含义。现在成本的高低问题，由于涉及产业转移，已成国际产业竞争和国内经济政策的焦点。从成本视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发展效果。降成本包括降低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两块。前者最重要的途径是提升生产率，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成本等；后者就是要通过制度改革，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如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等。



怎样从房地产角度为实体经济创造低成本的发展环境？

通过抑制房地产泡沫，为实体经济创造低成本的发展环境。一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让其回归消费品功能。这将为制造业降低成本、鼓励创新创造良好氛围。二是提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可用增加土地供应的办法来

缓解压力的举措。其实，这不仅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而且还要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度。这是降低这些城市房价上涨预期的根本办法，将会对房价持续上涨产生重大的抑制效果。三是要求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这是要大力发展城市群的重要信号，不仅可以抑制这些功能过于密集的城市房价上涨，也可以对三四线城市产生去房地产库存的效应。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N 有此一说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背后的认识差异

方世南

2001年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中文版中，有这样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年，阿克顿《自由的历史》一书在国内出版，中译者序开头第一句也用了类似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而事实上，英文原本说的是“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这里面，“tends”的意思是“趋向”，具有一种趋势性和必然性。将作为“趋向”意思的词，翻译为“导致”，与原意出入较大。阿克顿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和控制，得不到有效监督，任执掌权力者随意滥用，就是一种绝对权力，而这种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还是自称代表

自然法、代表进步力量、代表正义与和平、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只要它是以暴力为后盾，只要它失去了监督和制衡，必然要成为“绝对权力”。而成为“绝对权力”后，就必然是残暴、腐败和不义的。因此，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而不是所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深刻揭示了绝对权力与绝对腐败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所谓绝对权力，就是掌权者忘记了权力的本质属性，没有任何敬畏之心。同时，权力失去了监督制约，处在制度的笼子外不受约束，从而任性滥用。

这种思想，显然更符合阿克顿的原意。而翻译上的一词之差，虽不是谬之千里，但在学理还是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我们知道，权力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剑”。具有不同权力观的主体对于权力有着不同的解读，在实践中有不同的权力行使方式。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权力观与唯心

主义的权力观具有天壤之别。唯物史观坚持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坚持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必须为人民谋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而唯心史观坚持少数精英是历史活动主体的英雄史观，将人民排斥在权力之外，把权力用来为少数达官贵人谋取私利。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现象，反映了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权力意识形态，是典型的唯心史观权力观。

在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上级恩赐的，而是人民赋予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

权为民所赋与权为民所用，道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和民主的本质。它是对权力运行方向和运行目的的明确规定，重申了权力的服务对象，强调反对公私私用、以

权谋私，要求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不断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以此来防止在权力问题上“主仆关系”颠倒、遏制绝对权力和绝对腐败。

就现实挑战来看，防止绝对权力趋向绝对腐败，需要进一步构建优良的权力生态。一方面，要以权力流程推进权力清单化。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研发权力运行监控系统，使权力清单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明晰化、流程化、节点化，进而确保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监控、约束和规范。另一方面，要推进权力运行透明化。权力透明是推进权力运行透明化的根本要求。通过公开监控权力运行，通过公开预防权力腐败，通过公开制约权力任性。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公开载体、整合公开平台、提高公开质量、强化公开效果，最终形成生机盎然、永不腐败的优良权力生态。

(作者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观点集粹

“重大结构性失衡”表现在“资本脱实向虚”和“供需错配”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在《中国经济时报》刊文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解决中国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性部署。这种“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脱实向虚”问题。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低迷，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在今年前三季度总体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只增长了2.5%，大量资本“脱实向

虚”，涌入金融、房地产领域，不但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还会进一步推高实体经济的成本，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二是供需错配问题。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游客每年在境外消费超过万亿元，消费外流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因此，不断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应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政府应积极扮演“新技术践行者”的角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科大飞董董事长刘庆峰在新华网刊文指出：政府可以在创新中发挥很大的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搭建一个平台，让社会上的创业精神自由流动，让创业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新力和想象力。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规，在政策上提供支持，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其次，政府应积极地整合社会上可用的交叉学科资源，通过推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专项的建设，促进

科研创新，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第三，政府应该积极地扮演“新技术践行者”的角色。当我们有了全球最顶尖的技术成果的时候，政府应该率先使用，形成样板，之后向全国推广，继而向全世界推广。但归根结底，政府还是应该尽量让创新者自主发挥。最近几年政府的工作流程在不断优化，一方面简政放权，另外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政务”使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化。这一系列改变都对推动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和谐红利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中国领导科学》刊文指出：我们谈了很多红利，但不要忘记一个无形的、正在逐渐形成的、无声地扩散的红利：社会和谐红利。这个红利是无形的，不像其他红利那样需要通过某个个体表现出来；这个红利是累积而形成的，要靠持久的工作才能逐渐形成；这个红利是无声无息地扩散的，默默地影响着人们，

渗透到人们的心中。社会和谐红利在中国正在形成，是靠我们的改革。我们通过改革，使法律公正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增加了社会和谐；我们通过改革，使收入分配越来越协调了，不断走向社会和谐；我们通过改革，使社会保障惠及每一个家庭，促进了社会和谐；我们通过改革，提高文化建设水平，使社会风气更好，巩固了社会和谐。

N 学有所思

天下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梅松

70岁老人免费乘坐公交，学龄儿童免费9年义务教育，一些公共海域游泳免费，酒店为住客提供免费早餐，飞机为乘客提供免费盒饭。尤其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免费更是成为鲜明的主张，免费的网站、免费下载音乐、免费的游戏、免费使用微信工具、免费预订酒店客房、免费旅游攻略，免费的在线阅读、免费的视频等等，这几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

人们常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应是一条基本常识。对于个人来说，做什么事都得付出劳动，不要想着不劳而获。对于提供免费产品与服务的单位和机构来说，免费只是一种支付转移，或者以免费的方式来获得利益，无论何种方式，全世界不存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午餐。任何产品与服务都需要成

本，有时，只是这种成本没有让消费者承担。免费有许多种，一般可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领域。在公共物品领域，比方说，70岁老人免费乘坐公交，9年义务教育，这些属于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产品，但并不是说，这些不需要成本，相反，政府要为义务教育提供巨额的资金与服务，成本巨大，只是享受这些服务的学龄儿童及家庭不需要支付本应支付的费用。那么，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呢？政府并非非利润生产机构，这些费用都是政府用合法的强制手段，向公民个人和生产单位以税收的形式征收而来的，而征税额度的高低与提供公共物品多少，可分为高福利国家与一般国家。许多人羡慕北欧等高福利国家的许多公共产品都是免费的，但也要看到，这些国家的税收也是很高的。

市场经济理论认为，一切私人产品都应由市场提供，只是公共产品才能由政府提供。经济学家萨缪尔逊认为公共产品是，每一个人

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而且公共产品或劳务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消费的非排他性。而凡是可以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具有敌对性、排他性和可分性的产品就是私人产品。介于二者之间的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并非没有成本，而只是这种成本由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强制征收后再代纳税人支付，所有不能说，政府投资多少建立了公共医院，投资多少修建的公共图书馆，政府不是商业机构，其所有的费用只是代表纳税人来支付的。

还有一种与公共产品相类似的是慈善，一般受救助者也是免费的。慈善事业是人们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地奉献爱心与援助的行为和从事扶弱济贫的一种社会事业。通过救济、援助或者捐赠等

等这些手段来达到对人类的热爱或增加人类的福利。慈善也是有成本的，只是它由慈善施救者承担，是个人或者专业机构出于自愿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社会。

因此，这些公共产品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其背后同样是有成本的，只是人们习惯上，将这些产品与服务称为免费的。

由于政府不同于市场，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公平而不是效率，因此，必然带来效率低，也会产生许多寻租现象，造成资源浪费。正因为如此，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供所有的产品与服务，除了公共产品外，其余的都交给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市场经济下出现的许多免费产品与服务，那是另外一种经济现象，它与公共产品的免费不是一种原因。

(作者系文化学者)
来源：深圳特区报